

“游击专家”林维先二三事

□ 胡遵远

开国中将林维先一生8次负伤，立下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地称为“游击专家”。土地革命时期，林维先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战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红色传奇……

声东击西

1934年春，敌人对皖西苏区进行重点“围剿”，总兵力达16个团，占领了所有集镇和较大的村庄，封锁交通要道，建筑大小碉堡。中共皖西道委鉴于敌人对皖西重新“围剿”的严峻形势，决定由红八十二师掩护中共鄂豫皖省委机关和红二十五军军部向鄂东北转移。时任红八十二师（辖三个营和一个手枪队、一个交通队）师长的林维先和政委江求顺分析敌情后认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转移去鄂东北，从长岭关走最近，但这里是敌人重点防区，而且周围30里之内，都有大批敌人主力部队驻防，可随时增援。据此，林维先和江求顺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将红八十二师一分为二：政委江求顺率一营和手枪队向沙窝、新集方向游击，造成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向沙窝、新集向鄂东北转移的假象，引诱敌人向西追击，只要把敌人“追剿”部队调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转移压力会大大减轻；师长林维先率二、三营和交通队带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昼伏夜出，向长岭关运动，力争速战速决，在突破长岭关后，向麻城方向疾进，返回鄂东北七里坪老苏区。

在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后，林维先立即按照计划开始了行动。当江求顺率红八十二师一部向沙窝、新集方向活动时，敌人一个旅立即向这支红军追去。林维先得到报告后，迅速率部带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向长岭关疾进。凌晨2时，林维先亲率二营，直捣关上守敌阵地。关上守敌一面应战，一面向其他敌人求援。林维先指挥战士们一阵猛打，夺取了敌人营房，将关上两营敌人大部歼灭。这时，关东、关西两面的守敌纷纷向上攻来，林维先指挥二营战士居高临下，向两面还击。当关东之敌赶去增援时，三营和交通队乘机出击，一举歼灭关东侧阵地的守敌，掩护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

林维先接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已经突围的消息后，并没有率部立即撤退，而是以更加猛烈的火力向两

侧的敌人开火，然后逐步后撤，将两侧敌人诱至相互的射程内后，才率部悄然离去。关东、关西之敌夜战近一个小时，才发现在自相残杀，互骂对方“是瞎眼狗，只会咬自家人”。

调虎离山

红二十八军成立后，经过一年的游击，歼敌8个多团，部队迅速发展至2500多人，并恢复了一些农村根据地，成立了十多支便衣队。

1936年初，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战斗在大别山苏区的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林维先根据敌人此次“围剿”的特点，提出“分散活动”“调虎离山”的作战方针，获得上级的赞同。

随后，林维先率一个营的部队从金寨抱儿山出发，穿山越岭，遇弱敌猛打一阵，遇强敌绕道而行，三天三夜，大小仗打了10多次，3月17日，到达了湖北孝感平头山，隐蔽休息。林维先率部一路连战连捷，让敌军以为红军主力要跳出大别山，急调参加“围剿”的两个师追击，又令孝感保安团堵截。林维先率部机智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并对敌保安团发起奇袭，一举击破了敌保安团的堵截，歼灭近半。

第二天，林维先接到报告说：青山镇敌人出动一个连，押着100多个民夫，运送一批军用物资。林维先立即命令全营做好战斗准备，隐蔽在青山镇东边山林里。上午10时，敌人进入伏击圈，林维先一声喊打，战士们一齐开火，很快消灭了这股敌人，还俘虏了敌人二十五路军的后勤部长，缴获了大批银圆、军服、药品，还有一叠敌人二十五路军的“通行证”。

此次战斗后，林维先率部押着俘虏，返回大别山。途中，林维先故意当着被俘的敌人后勤部长的面和指战员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提出“红二十八军已进入桐柏山区，很快就会和红二十五军会合，我们后卫队一定要在两天之内与主力汇合”。晚上，又故意让警卫放松警惕，放跑了敌人的后勤部长。

敌后勤部长逃回敌司令部后，立即报告了红军的“动向”。敌人追击部队立刻向平汉路西追击。大别山苏区的敌人压力骤然减轻。

林维先得到情报后，立即让大家换上了缴获的敌人军服，手持敌二十五路军通行证，向大别山区进发。沿途发现敌人部队一个营。林维先化装成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团长，让

敌营长集合部队训话。当敌人集中后，林维先命令红军战士缴了这股敌人的枪。林维先处理了敌人几个营连干部，其余全部遣散。7月中旬，林维先率部胜利返回大别山，在金家寨的熊家河与红二十八军会师。

伪装歼敌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林维先在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任一营营长，和坚持在金刚台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赤城二区苏维埃主席张泽礼（人称“张三铁匠”）并肩战斗。

当时，国民党在作战区域要道上大肆筑炮楼，实行所谓“堡垒战术”，严格封锁人员与物资的进出，以此阻断根据地之间的交通。林维先认为：红军没有炸药，战士们更没有学习过爆破技术，要消灭敌人的炮楼，必须采取奇袭的方式。

一天，林维先得到情报，驻熊家河的敌人一〇六师外出“清剿”，留下当地的民团守卫炮楼。于是，林维先立即制定了一个智取敌人炮楼的方案。

第二天清晨，林维先和战士们化装成国民党十一路军的伤兵队，稀稀拉拉地向着熊家河走去。林维先、张泽礼和手枪团三分队扮成护送人员，走在最前面。

按照既定方案，林维先率部首先来到熊家河畔柴沟的敌人据点外。这里的守敌只有民团的一个班。林维先等大模大样地来到敌人岗哨前。敌人上前盘问，林维先回答：“老子是十一路的，送彩号到立煌（金寨县的前身）那边去。老子卖命，你们蹲在上面倒清闲，还不快给我滚下来，帮我们找民夫来抬彩号。”

敌人岗哨回答：“长官，这里民夫不好找呀！老百姓都是通共的。”林维先听后“大怒”，带着几个护卫就进了炮楼。敌人头目上前迎接，当场被林维先俘虏。其他敌人也纷纷被战士们缴械。

占领敌人的炮楼后，林维先立即指挥战士们拆除炮楼。林维先让战士们指挥被俘虏的敌人，找来一根粗大的木桩，用力撞击炮楼的墙壁，在将墙壁撞得摇摇欲坠之际，林维先立即叫停，并和战士们说：“这样就好，既破坏了敌人炮楼，远远望去又像是个好的，让附近其他据点的敌人不会发现这边出了情况。”

不久，林维先带领部队向着距此不远的赵家湾炮楼前进。该炮楼同样只有民团看守。林维先用同样的办法

端掉了炮楼，同时对俘虏进行了教育，宣传了党的政策，动员他们去喊开下一个炮楼。俘虏们满口答应。

林维先命令战士们把缴获的枪下了栓，让俘虏们背着，押着他们一起去下一个炮楼。一切如林维先所料，这里的敌人也很快当了俘虏。就这样，林维先率领战士们一枪未发，一口气端掉了敌人的十个据点。

第十一个炮楼是熊家河地区敌人封锁线上的最后一个据点。林维先率队来到炮楼前，由张泽礼喊话：“喂，我们是十一路的！”

炮楼旁边站岗的敌人立即走了过来，但在距离很远的地方突然停住了脚步，接着就向后跑，一面跑一面大叫：“不好了，张三铁匠来了！”

原来，驻守这个炮楼的敌人此前和张泽礼的队伍交过手，那个站岗的团丁还被俘虏过（后被释放）。炮楼里的敌人听到报警，立刻关闭了铁门，架起机枪，准备向外射击。林维先一面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一面和张泽礼商量道：“你的大名敌人知道，咱们先礼后兵。”张泽礼站在机枪射程外，对着炮楼里的敌人喊话：“我就是张三铁匠，你们总该知道我们红军便衣队的厉害吧！告诉你们，熊家河的十一个碉堡，我们半天工夫就端掉了十个，你们要是识时务，就马上缴枪投降！”

炮楼里的敌人听到喊话，半天没敢开枪，林维先一面命令给敌人时间考虑，一面调来神枪手，瞄准敌人的枪眼和炮楼顶端，防止敌人突然反扑。过了一会，林维先发现炮楼顶端有几个敌人在活动，其中一个敌人举枪向下准备射击，于是命令神枪手开枪，将这个敌人击毙。

不久，敌人的机枪响了起来，林维先随即命令机枪手射击，压制敌人的火力，又命令战士把一束手榴弹掷到敌人炮楼的铁门上，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铁门被炸倒。正在敌人惊慌之际，林维先又展开了政治攻势：“喂，投降吧！缴了枪，保你们活命！”

敌人立刻把枪都扔出门外。就这样，不到一天时间，林维先率领便衣队把熊家河的十一座炮楼全部端掉，一举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线。

（摘自2023年6月8日《人民政协报》）



河北省阜平县城西南马兰村属下，有一座仅有十来户人家的坡山村。坡山村很小，小到连《河北省分县地图册》和《阜平县地名资料汇编》上都查不到村名。但是，就在这个小山村里，世界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出版了。

为了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引导，1944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邓拓编选《毛泽东选集》，并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选编计划曾报告了中央宣传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以及中央宣传部，并得到王稼祥的批准。中央宣传部对这部《毛泽东选集》拟收的著作，提出具体意见。

《晋察冀日报》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机关报，同时报社又是党的出版社。报社领导机关驻河北省阜平县城北的雷堡村。邓拓受命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以后，便同报社的编辑人员一起，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仅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编辑任务。全书共分五卷，包括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著作，抗日战争方针政策 的著作，军事战略方面的著作，有关经济思想的著作，关于党的思想工作风建设方面的著作。

邓拓在《毛泽东选集》卷首写了《编者的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

开篇篇《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定稿于同年1月15日，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最早刊登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晋察冀日报社排印本用的是毛泽东修改过的复写稿，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封面有毛泽东亲批的一句话：“送晋西北转送五台山彭真同志”，后边是毛泽东的签名。彭真看后，立即交邓拓，嘱在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出版。邓拓拿到稿子后，认真读起来，读后非常激动地拍案叫绝说：“这本书太好了，是划时代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他随后怀着钦佩之情写了一首诗：“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城绕指到眉端。阵图开处无强敌，翰墨拈来尽巨观。风雨关河方板荡，运筹帷幄志屯艰。苍龙可缚缚在手，且上群峰绝顶看。”

1944年5月，《毛泽东选集》开排不久，晋察冀分局要在六七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为了让参加会议的同志人手一部，要求《毛泽东选集》在会前赶印出来，按当时的条件，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书要在两三个月内排印出

首部《毛泽东选集》出版前后

□ 黄禹康

版是不可能的，经过请示，分局同意先印四、五两卷。印刷厂的同志们加班加点，赶排赶印，终于在高干会议期间，把四、五两卷送到会上。从1944年初上级决定出书，到9月就出齐五卷。《毛泽东选集》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是5月，实际上是定稿付印时间。

在排印过程中，《毛泽东选集》的书稿根据上级意见曾作过一些调整，对原先编入的《论新阶段》一文只保留了其中的第七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其他章节都抽出来了，并且补充了1944年6月13日首次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与中外记者团谈话》（6月12日的谈话）。但当时忘了对这部书的出版时间作相应的改动，因而发生了1944年5月版的书却收入了6月发表的文章这一问题。

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页。它有力地、系统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并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积累了经验。刘澜涛在评价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时说：“邓拓在客观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主编的这部《毛泽东选集》，事属初创，当然很不完善，但它却是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在边区出版史上也值得大书一笔。”

（摘自2006年12月4日《浙江日报》）



林伯渠的眼镜

□ 陈斌

书籍和文化用品。自己的眼镜破损了，他却不舍得用这些钱去买一副新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过林伯渠，这位曾经掌握红区财政大权的财政人民委员总是“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

这副眼镜，还跟着林伯渠走遍了大江南北，见证了林伯渠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林伯渠经常跋山涉水到各县调查研究。每次出差开会回来，林伯渠都要拄根棍子，到附近窑洞挨个走走，与老百姓唠唠家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他不顾身体衰弱，仍然夙夜在公，体察民情，不辞劳苦。

林伯渠还特别注重从小事出发，耐心地教导、启发子女，培养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1938年，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女儿林利。照理，父女一别多年，有很多知心话要谈，可是简单询问了家乡近况后，林伯渠却问道：“你知



林伯渠用过的眼镜和眼镜盒

道大米多少钱一斤，盐巴多少钱一斤，布匹多少钱一尺吗？”林利一时语塞。她本以为父亲会给她讲一些革命道理，没想到父亲会问起这些柴米油盐的家务事来。看到女儿疑惑，林伯渠语重心长地说：“这些都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事，关心群众，就不能不关心这些事情。”

2016年，林伯渠的这副眼镜被认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这副眼镜见证了林老一生艰苦朴素、一心为民的革命历程，也将激励广大党员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党的好传统、好作风。

（摘自2021年第15期《中国纪检监察》，原标题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林伯渠的眼镜》）



年轻有为的红军将领寻淮洲：

□ 刘良恒



寻淮洲，1912年生，湖南浏阳人。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随浏阳工农义勇队参加秋收起义，并随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参加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反“会剿”作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随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排长、连长，红1军团第12军34师营长、团长。

1930年11月，寻淮洲率红34师第100团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因为指挥果断，作战有功，被任命为红12军第35师师长。随后，他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屡建战功。1932年3月任红1军团第15军45师师长，12月任红21军军长。

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寻淮洲率部牵制国民党军几个

师的兵力，保证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取得黄陂、东陂两个战役的胜利，荣获中央军委特别嘉奖。黄陂战斗中，他率红21军插入敌后，切断国民党军第52师退路，为全歼该师创造了条件。同年7月，红21军与红7军改编为红3军团第5师，他任师长。根据党中央指示，红3军团4师、5师和红5军团34师组成东方军，执行收复闽西连城、新泉苏区和开辟闽北新苏区的任务。他率红5师从江西广昌头陂地区出发，向福建进军，入闽作战几个月，连战告捷。

1933年10月，寻淮洲被任命为红7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7月，红7军团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兼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在4个月时间里，他指挥部队转战闽浙皖赣边几十个县，行程3200多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击退其无数次的围追堵截，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寻淮洲率部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任第19师师长，奉令先行出击浙皖边，继续率部英勇作战，连连取胜。12月14日，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同敌数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不幸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摘自2011年6月26日《人民日报》）